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日〕井上 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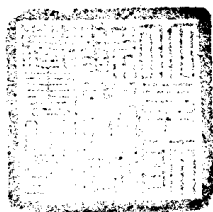
宿久高 林少华 刘小冷译

孙连璧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5648



人 民 出 版 社

975648

封面设计：马少展

井 上 清

日本帝国主义の形成

根据东京岩波书店1972年版译出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Riben Diguo zhuyi de Xingcheng

〔日〕井 上 清 著

宿久高 林少华 刘小冷译

孙连璧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229,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9,700

书号11001·657 定价1.15元

译者的话

本书是日本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的著作，叙述了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历史过程，对日本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阐明了关于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形成的见解。书中还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日本人民的压迫、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叙述了被压迫和被侵略人民的反抗斗争。本书说理清楚，材料翔实，很有参考价值。

我们根据原书 1972 年版翻译，前言、索引未译，其他均按原文译出，保持原著面貌，供研究者参考。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中错误和不妥之处难免，尚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1983年9月

目 录

绪 论	天皇制的侵略主义与近代帝国主义·····	(1)
1	天皇制的侵略主义·····	(1)
2	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与近代帝国主义·····	(15)
第一章	列强瓜分东亚的竞争与日本·····	(30)
1	围绕控制朝鲜的日俄抗争·····	(30)
2	马关条约与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	(44)
3	出兵镇压义和团, 占领厦门计划的失败·····	(58)
4	太平洋争霸与日本·····	(70)
第二章	资本主义的确立·····	(77)
1	资本主义产业的确立·····	(77)
2	资本主义与地主制的结合·····	(90)
3	侵略与从属的经济结构·····	(97)
第三章	天皇制的变形·····	(106)
1	天皇制与资本家、地主阶级的同盟·····	(106)

2	治安警察法与帝国主义·····	(121)
第四章	帝国主义思想及其批判·····	(131)
1	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	(131)
2	民众与帝国主义批判·····	(148)
第五章	走向日俄战争·····	(157)
1	是日英同盟还是日俄协商·····	(157)
2	日俄开战·····	(176)
第六章	日俄战争的结局及性质·····	(195)
1	战局的发展和日军的困境·····	(195)
2	朴次茅斯和约·····	(205)
3	日俄战争的性质·····	(216)
第七章	殖民帝国的形成与民族运动以及同列强的 对立·····	(228)
1	合并朝鲜、形成殖民帝国·····	(228)
2	对台湾、库页岛、朝鲜的统治·····	(240)
3	经营满洲与列强以及中国民族·····	(254)
第八章	日本帝国主义成立时期的政治结构·····	(271)
1	“军部”的形成·····	(271)
2	垄断形成的开始及政党与民众·····	(290)

结 语	日本帝国主义的确立及其各种矛盾·····	(316)
1	第一次大战与日本帝国主义·····	(316)
2	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	(328)
3	各种矛盾的展开·····	(333)
参考文献说明·····		(344)

绪 论

天皇制的侵略主义 与近代帝国主义

1. 天皇制的侵略主义

近代日本史上帝国主义思想最有力的鼓吹者、从甲午战争后至太平洋战争失败前经常同日本统治阶层中最为帝国主义化的一派勾结在一起的德富苏峰，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在其自办报纸《国民新闻》上连载了《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的长篇文章，继而把它作为单行本发行，使之很快成为当时最大的畅销书。在该书序言中，苏峰说道：自己的立场一贯在于“君民一德、举国一致之帝国主义，即对内实行平民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并一贯以皇室中心主义统辖二者”。这里所说的平民主义，并不是他曾在一八九〇年前后提倡过的平民主义(原话为“个人平民主义”)，而是“国家平民主义”，即名为平民主义，而实为“天皇臣民主义”。

按照苏峰在该书正文中基于这一立场的说法，“日本近代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虽是丰臣秀吉，但“至为遗憾”的是，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日本国民的帝国主义“雄心”暂时地受到了压抑。不久，到了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其“复兴的第

一声”从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中有关入侵堪察加、库页岛、满洲的论调上发了出来。在下一代的佐藤信渊那里，“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只有在皇室中心主义之下才能被有效地和充分地付诸实践的真理”，得到了阐明。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一八二三年）一书中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因此，皇国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据这一天理，皇国要首先并吞满洲，继而将中国全部领土划入日本版图，而后从东南亚进军印度，“合并世界各国”。

接着，苏峰介绍并赞赏了桥本左内、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及其他幕府末期思想指导者的五花八门的“帝国主义”。就连幕府末期名流中唯一的非“帝国主义”论者横井小楠，当时也被他当成“精神帝国主义”论者。在苏峰看来，优秀人物必然是帝国主义者。

近代帝国主义是以世界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为基础的，是它的必然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同古代、中世纪及资本主义初期屡见不鲜的帝国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既具有各国间共同的本性，同时也因各国历史条件而带有各自的特征。苏峰上述的议论，最充分地表现了日本近代帝国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特征，透露出近代帝国主义同天皇制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之间的历史关联。

一八六八年打倒德川幕府后建立的天皇政权，从一开始就是极富侵略性的。早在天皇政权将反对派大名的武力抵抗基本镇压后不久，即同一年底，政府首脑部门便制定了侵略朝鲜的计划。参议木户孝允在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回答议定岩

仓具视关于“前途事件”的谘询时对其几项作了说明。他在那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至关紧要之事有二，一望迅速确定天下方向，二望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若其不服，则兴问罪之师，以伸张神州之威。彼时，一举改变天下陋习，确定目标于海外，故百工杂艺须齐头并进，监视国内各部，一扫讥人之短、责人之非而不自反省之恶弊。必将大益于国家。”

木户说要“责问”朝鲜的“无礼”，然而这时朝鲜国既同天皇政府尚无任何关系，又无旧幕府时代遗留下来的日朝间的纠纷，“无礼”从何谈起？天皇政府通知朝鲜，日本已变革政体，以及对马藩士将要求新政府同朝鲜建立邦交的国书递交给相当于朝鲜对日交涉窗口的釜山的官厅一事，发生在十二月十九日，即木户向岩仓提出征韩为当务之急后的第五天。釜山的朝鲜官员发现这个国书以及由对马藩主以事前通知的形式递交的日本国书的文件格式，不符合日朝交往文书的先例，而且文中出现了只有大清国皇帝才能对朝鲜使用的“皇”、“敕”的字样，认为这是日本对朝鲜的蔑视，因此，就连将国书转呈朝鲜中央政府一事都予以拒绝了。日本政府方面视此为“无礼”，把它当作征韩论的借口，而在为这种借口没找到任何材料的情况下，木户便如上述主张征韩了。

在木户和岩仓以及军务官副知事、当时政府军事方面的最高实权人物大村益次郎之间，从这时起便就征韩认真作了计划，这可以从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一月至二月的木户

的日记和信件中详细地看出来。据推测，在这年一月上旬木户写给大村的长信中说：“自一月一日大体商谈以后，仍反复考虑将来之大势”，望军务官制定远大方略，在平定函馆的榎本武扬等旧幕府军队之后，整顿朝廷独自の陆海军备，不依靠诸大名而以朝廷兵力来“开辟”釜山。所谓“开辟”，大概指的是“开发”，但作为其前提，则必须占领，因此，木户也对武力征服的顺序作了如下说明：

“主要以武力开辟韩地釜山。吾知此举非但无物产金银之利，反将蒙受损失，但为确立皇国之远大方向，使亿万苍生瞩目内外，切实提高海陆诸般技艺等，并使他日皇国振兴，历经万世而不衰，则舍此别无他策。有议论曰，至今尚未能开辟虾夷之地（北海道），故不宜染指他方等，此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见……。依愚见，以建立皇国国体而论，细推宇内事理，韩地一事乃生光辉于东海之端始。万一交戈之时，切勿急进；规定年年所需费用；占领一地之后，熟虑日后攻占之策；持之以恒，努力不懈，不出两三载，天地必能大改其观，一旦付诸实施，则万世不拔之基将愈趋巩固”。（《木户孝允文书》第三）

木户、岩仓等人，从这时到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十一月赴欧美之前，一直在寻找机会实施这一计划。日本政府方面，把朝鲜对日本国书中“皇”、“敕”字眼的指责，视为对日本有利，日本一直坚持使用此种字眼，对待朝鲜较之旧幕府时的交往还“低贱二三等”，企图使朝鲜“成为属国”。一八七〇年，政府开始同清国交涉建立邦交，当时的重要目的是，通过打开日本与清国的对等交往的大门而为和清国一样骑在

朝鲜头上的主张制造根据。^①

据推测，在一八七一年以前，木户、岩仓等是狂热的征韩论者，而在野的西乡隆盛毋宁说是反对征韩的。从一八七二年末到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岩仓、木户同大久保利通一同出巡欧美，留守政府中的参议兼禁卫都督、元帅西乡是最大的实权人物。以他和参议板垣退助、外务卿（后兼参议）副岛种臣等为中心，最初计划侵略台湾，随后计划侵略朝鲜。众所周知，西乡等人的征韩论，由于受到从欧洲回国的岩仓、大久保、木户等人的强烈反对而告失败。然而在那以后掌握了政府实权的大久保等人却于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实施了西乡等制定的远征台湾计划。接着，翌年（一八七五年）九月，日本海军对朝鲜江华岛的炮台进行非法挑衅，使之开炮，遂以问“罪”为由准备战争，恐吓朝鲜政府。一八七六年二月，迫使朝鲜在最初的日朝修好条规上签字。一八六八年以来的征韩论，至此实现了其目的的第一阶段。

日朝修好条规第一条“朝鲜国为自主之邦，拥有同日本国平等之权”的规定，引起了征韩激进派的不满，但政府的目的在于首先明确朝鲜不是清国的属邦，以为日后将朝鲜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创造一个前提条件。这一条约本身确实是不平等的，第十条规定了侨居朝鲜的日本人具有当时日本受尽欧美各国百般欺侮的治外法权与租界地。在这里，日本已成为把欧美各国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同样强加给邻国的国家。而且条约中规定“两国政府不得修改此约”，以使之成为

① 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一年政府征韩论的具体事实，在我的论文《征韩论与军国主义的确立》（载井上《日本的帝国主义》Ⅱ）中有详细论述。

永久束缚朝鲜的桎梏。

不仅如此，在根据该条约于同年八月签定的两国贸易章程，其第七条还规定“日本国人民可用日本国各种货币交换朝鲜国人民的所有物”，并在其附件中规定日朝两国“数年间”均无进出口关税。

谈到日朝两国的均无关税，形式上虽然是“平等”的，但这个条款若同日本可以用包括银行券在内的日本“各种货币”，无限制地购买朝鲜物资这一贸易章程联系起来的话，那末，由于这时日本已经在经济上、商业上把朝鲜变得完全无异于国内市场的一部分，日本对朝鲜的经济侵略从此也就肆无忌惮地长驱直入了。朝鲜的金银通过同本来没有价值的日本纸币的交换而大量流入日本，朝鲜农民被日本商人将稻米和大豆用廉价一购而空。强有力的商业资本同贫穷的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即便是“公正地”进行，也是绝对不利于小生产者的。况且日本商人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有待无恐地胡作非为。因此朝鲜的小商人和小生产者，很快就变成了以三井物产合股公司及第一银行为首的日本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牺牲品。

在六年后的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日本迫使朝鲜政府同意雇用其军事教官。朝鲜士兵对此抱有的不满情绪同身受日本商业资本无情掠夺的朝鲜人民的不满情绪一起爆发了。这年七月，汉城发生了兵变（壬午兵变），士兵和市民袭击了日本公使馆。日本政府索性以此为良机，威吓朝鲜政府，迫其向日本道歉并赔偿损失，还迫其承认为警卫公使馆而在汉城驻扎若干日本军队的权利。就是说，伴随着经济侵

略，迈出了政治侵略的第一步，军事侵略也已萌芽。从此，日清两国在朝鲜的势力争夺开始公开化，并一年比一年激烈。

接着，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十二月，日本政府作出支援朝鲜统治阶层内部民主改革派政变的姿态，企图使可能在成功后出现的朝鲜政府从属自己，但政变在得到清国援助的保守派的反击面前很快就失败了（甲申政变）。于是，日清两国出兵朝鲜，甚至产生了战争危机，但日本政府尚无充分准备，所以一八八五年四月，首相伊藤博文自任大使，在清国天津缔结了妥协条约。天津条约第一条规定日清两国同时撤出军队；第二条规定今后日清两国均不向朝鲜政府派遣军事教官；第三条规定：“将来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而须日清两国或一国派兵时，应先互行文知照，其事件平息之后，当即撤回，不再留防。”第三条等于日清两国根本无视朝鲜国的主权而相互承认出兵朝鲜的权力。所以，这是日本对朝鲜的政治侵略的第二步。另外，从一八八〇年开始进行的、以与清国交战为目标的军备扩张，在天津条约后更加迅速地、大规模地展开。九年后发动了日清甲午战争。

何以说明天皇政权诞生以来一贯的、如此明显的侵略主义呢？逐一地详细考察，如一八六八——一八七一年的木户、岩仓政府时期，一八七二——一八七三年的西乡、板垣政府时期，其后的以大久保利通为最高实权人物的政府时期以及继任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掌握领导权的政府时期等，每个时期都各有其特殊的国内或国际的情况。

就木户、岩仓而言，六八年内乱中拥护天皇政权的诸藩，

不肯轻易服从中央政府的威令，而中央政府又不拥有强制其服从的兵力和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征韩论的直接目的，是为迅速加强中央的军备，建立威信，削弱诸藩力量而将诸藩与普通民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对外战争。西乡、坂垣为了安抚士族大众——天皇政府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生存不得不实行各项资本主义改革，使他们日趋没落——的不满情绪，用西乡的话来说，作为“将希冀内乱之心转移于外、行兴国之远略”，而急于征韩；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岩仓、大久保和木户等建立起来的官僚独裁，成立以士族为中心的政权。大久保政府的远征台湾，是企图缓和前年被他们逐出政府的征韩派，特别是萨摩士族的激愤。江华岛事件与以此为借口强加给朝鲜的不平等条约，也发生在大久保政权之下，其直接目的仍在于将怀有不满情绪的士族的注意力引向朝鲜，以及通过镇压邻国来树立政府的威信。

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将屡次出现的政府反对派的注意力转向出征外国这种直接的动机和目的以外，还有什么“伸张神州之威”（木户）、“振兴国家”（西乡）“耀皇威于海外”（大久保）等各种样式的、天皇制统治阶层中共同的侵略欲望。这是天皇制官僚、军人对封建领主阶级所固有的领土扩张欲望或“金银财宝”的占有欲的继承。经济上，是同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攫取“金银财宝”与攫取殖民地的欲望相互交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政治上，这种侵略主义和这样一种要求同出一辙，即自十九世纪以来欧美各国一直侵略东洋，日本本身也被强加给不平等条约，受其压迫，对此日本无法直接向欧美各国反击。因而，它企图通过大力压制弱

小邻国来找回受欧美压迫的损失。

这种以屈服于欧美和侵略邻国为日本出路的想法，在幕府末期就已经由长州的吉田松阴——后来成为明治政府领导人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老师——明确地阐述出来。一八五五年（安政二年）他在狱中写给兄长的信中，作为“同志一致之意见”写道：“俄美和亲条约一定，我方便绝不可破坏之而失信于夷狄。只宜严守章程，加深信义，趁此时机培养国力，分割易于攻取之朝鲜、满洲^①、中国，将同俄、美交易中之损失，复以鲜、满土地补偿之”。另外，佩里来航前的佐藤信渊等人单纯地幻想由日本先征服周围各国以对抗欧美列强对东洋的侵略，但后来觉察到在现实中日本也受着欧美的直接压迫，难于同其抗衡，却又不满足于一味屈从，从这种立场出发，出现松阴那样的想法也是理所当然的。

比松阴更为通晓世界形势，企图通过主君松平庆永撼动幕府政治的越前的桥本左内，一八五七年（安政四年）提倡独特的日俄同盟论。此论认为，争夺将来世界霸权的将是英国与俄国，因为日本单独无法抵抗西洋列强，所以应向俄国遣使，“乞求和亲”，结成同盟，接受其援助。这样一来，在尚未达到“托国于俄”的期间里，外国便将干扰日本，因而，“至此之前尽量依赖美国，竭力阻止英夷跋扈。”为此，就必须同意哈里斯向幕府提出的签定通商条约与派驻公使的要求。于是，“视美国为一东藩，思西洋为我所属，以俄国为兄弟唇齿，掠夺邻国乃当务之急”（《桥本景岳全集》资料二

① 满洲，指我国东北地区，与其他国家并列不妥。——译者

五二)。这种说法虽比松阴更为软弱，然而在同强大的欧美各国结成同盟或和亲的同时，侵略日本邻国，由此补偿对欧美的屈服所带来的损失这一基本想法上是一致的。

左内、松阴的观点，被他们的直接或间接的弟子——明治政府领导人——继承下来。以守“信义”为理由屈从于欧美列强，同时在其支持下侵略朝鲜、台湾，可能的话，甚至侵略中国本土，这点一直贯穿着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例如，一八七二年以来制定的、一八七四年付诸实施的远征台湾计划，就是由于受到了美国驻日公使及其推荐的外务省顾问江道尔（美国退役将军）的指导才做到的。西乡、坂垣一伙的征韩论是在得到俄国驻日公使的默许的基础上制定的计划。一八七四年以后大久保政权的侵朝政策是英国驻中国公使等人暗示给为远征台湾处理善后问题而去北京的大久保利通的。大久保死后，主要由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推行的征伐朝鲜到甲午战争的侵略主义，也没有偏离在对近邻的侵略当中找回从属于欧美的损失这一念头。但在这一时期实行的侵略主义是从属于英国而同俄国敌对的。在国内关系方面，同将反政府派的注意力转向对外战争这一政治因素相比，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掠夺朝鲜这一经济因素更为强大起来。实际上，通过用日本纸币交换的方式从朝鲜掠夺金银和粮食，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中冢明《日清战争研究》）。

那末，在十九世纪以来欧美各国不断侵略东亚的形势下，日本除了明治政府所选择的道路以外就不可能维护本国的独立和谋求繁荣了吗？明治维新的变革，没有成为资产阶级民